

一位伯克利教授致基督徒的话

我成长在一个定期参加圣公会礼拜的美满的家庭。从我出生的那天起，父母的关爱就一直伴在我身边，直到43年之后的那一个月，他们双双离世。先是母亲因急性心脏病离世，父亲随后由于过度悲伤得了肺炎也不幸离世。但就宗教而言，我就如同在德里长大的虔诚的印度教徒，或者德黑兰严守教规的穆斯林。简而言之，在我对宗教方面毫无见地的时候，我就被大量灌输了抵触基督教的理念。在我成长历程中，教会总是教育我们圣经是好的、有益身心且并且是有大量神话的。在1973年我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前，我对此并无太多感激。我打电话给我父亲并试图和他分享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爸爸，我终于成为基督徒了！”电话那头的父亲停顿了好长时间才说道：“好啊，那太有趣了，儿子。你之前是个异教徒吗？”正确的答案是“是的”，但是父亲话语中的内涵远超过了我当时的理解力。

从1965年的秋天开始起，我大概知道我的家庭对基督教并不那么热情。那时我的兄弟特德（我的大儿子也取的这个名字），他是三个小孩子中年纪最小的，离开了家庭去Colgate大学求学。从那以后，我父母参加礼拜的次数大大减少了。我想父母真的认为当孩子们陪伴在他们身边时，他们虔诚地参加礼拜的次数足以超越上帝所能有的期望。此外，我清楚地记得1980年我和父亲的一次谈话，我们讨论的内容是有关社会公德的一次公开辩论。我以我的立场和圣经一致为由来我坚持我的观点，父亲却不假思索回答道：“儿子，在那种情况下，圣经是错误的。”

我不想留给任何一个读者我父母不好的印象。这样的结论将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我深爱的父母特别的好，因为世界要求人们应当品行良好。我对上帝真的是充满感激的，因为他赐予了我深爱我的父母。但事实上我成长在一个非基督徒的美国家庭，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下面我与你分享的内容将毫无意义。我需要提醒一点，我母亲直到去世才承认她年轻时的基督教信仰（在纽约艾尔麦拉的那段时光），但我父亲一直对我在1973年做出的信仰基督的决定不十分满意。

我于1944年出生于密歇根州的大激流域。一岁时，我们搬家去了纽约的锡拉丘兹，在那里，我上了幼稚园并在樱桃街小学读了一二年级。8岁时，我们搬家去了希望之乡--加州。我们住在门洛帕克市，紧邻风景秀丽的斯坦福大学。我在离家仅仅两个街区的希尔维尤小学读了三到七年级。十三岁时，我们全家又搬回了父亲的祖籍地大激流域，当时我父亲在大激流域最大的公司-美国座椅公司获得了一个重大晋升（随后它被本地销售巨头-安利公司在规模上超越）。

我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不仅仅体现在他对家庭的贡献上。父亲在大激流域中部长大，与后来成为第37任美国总统福特家只有两栋房子那么远。父亲早于福特总统一年去了密歇根大学，而且他们保持了一生的友谊。我们在大激流域去的恩主教教堂是一座在社会上很有名望教堂。如果你很渴望成为西密歇根权力中心-肯特乡村俱乐部一员，这座教堂也是个很好的去处。我父亲最终晋升到了公司的二三号人物，但在1968年，当公司总裁杰姆斯韦尔默朗退休后，我父亲输掉了总裁竞选并选择了提前退休。有趣的是，我父亲竞争对手的儿子后来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法学院院长，而我在那里做了18年的化学教授。

父亲是努力工作的笃信者，当他1933年从密歇根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正值经济大萧条最严重时期。找不到与土木工程相关的工作，父亲回到家乡大激流域找了份美国座椅公司保洁员的工作。他平步青云，随着二战的到来，他最终成了一名工程师，为美国战斗机设计座椅。战后父亲在公司继续获得晋升，最终爬到了前文中所提到的职位。父亲的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是我希望和他一样努力工作。我十岁时找了份送报的工作。两年后我获得了一份报酬更高的工作-放学后在蒙罗公园皇家大道上西夫伟连锁商店卖报纸。在大急流域，我的第

一份工作是在湖畔饭店，每周六我在那里上班，薪水是 0.75 美元每小时。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始于 1961 年的夏天，公司是密歇根州立电镀公司，它位于大急流域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工作的内容是把小的汽车零部件安装到流水线上，两小时后，等电镀完成时再把它们取下来。周围的温度大概是华氏 120 度，我的薪水是每小时 1.5 美元，这是我真正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1961 年的仲夏，我浑身长满了红斑。我被送到父亲的好友家庭医生 Joseph Whinery 那里诊治。Whinery 医生检查了那些红斑，询问了我夏天的生活情况，并用最严肃的语气对我说：“孩子，你得从电镀厂辞职！”我难掩兴奋，但意识到检查报告出来我还能如此兴奋，可能对父亲造成影响，我尽力装作很受打击的样子。出了 Whinery 医生诊所的门，我十分的兴奋，心想一直到夏天结束我也不需要找工作了。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失业了，世界仿佛在我脚下。我们住在大急流域美丽的菲斯克湖畔，我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在温暖的天气里在湖里游泳和在竹筏上享受阳光。无所事事自由自在的感觉真是棒极了，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两周的时间。在那个时候，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名曰无聊。

为了对付萎靡不振的情绪，我觉得一些冒险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我打算骑着 125CC 的 Lambretta 摩托车环游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密歇根湖。六百英里的旅程确实值得纪念，并且在一周之内完成了。然而，无聊的情绪很快又回来了，并且更加强了。这是一段令人警醒的经历：在 17 岁的年纪，我拥有了曾想拥有的一切（对我来讲，完全独立，没有工作的束缚），但最终还是厌烦了这样的生活。在这样的境遇中，我考虑了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特殊的晚上我试图想睡着，觉得头上的天花板有 100 英尺高，而实际上只有标准的 8 英尺高。通常我一上床就会睡着，但 1961 年 8 月的那个夜晚，我本能地知道我无法入眠了。我想我肯定可以在楼上父母的书房里找到一本好书，于是我走到了书房找到了一本由英国圣公会出版的名叫《王子的生活》的书。这是一本有关耶稣的书，那一晚我把那本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直到凌晨 5 点。那一晚我没有变成基督徒，我甚至不信会寻找到生命的意义。但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宇宙存在是有目的的，那么总会与耶稣的生命存在着联系。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每天早上读圣经的一个章节，直到 12 年后我生命中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

在父亲的引荐下，我去了毗邻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来完成我的大学学业。我迅速锁定了波士顿最大的教堂之一的 Holy Trinity 圣公会教堂，开始了四年的定期礼拜生活。在那时，我继续对基督教怀有戒心，事实上更快了。Theodore Ferris 高级牧师是个有神论者，也是一个深受大家喜爱的年老的热心的人。然而，教堂的教义具体表现在不可知论神学上，其表人物有德国学院派的鲁道夫布特曼，英国圣公会大主教 John A.T. Robinson，以及临近的哈佛大学教授保罗蒂里希。蒂里希倾向于宣扬“上帝是一切存在的基础”，蒂里希和他的追随者认为这是伟大而深远的思想。数年之后，当我在美国化学协会的全国演讲会上做演讲的时，我很高兴能住在靠近 Holy Trinity 圣公会教堂的旅店里。在科学会一个下午的时间间隙中，我走进宏伟的圣殿，希望去寻找精神生活存在的证据。教堂还提供免费读物给游人，我拿了一本 8 页的小册子，名字叫 *Holy Trinity Episcopal Church*。我认为虽然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并没有达到某种精神境界，但是也许我也同时吸收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我把小册子带到了旅馆，我发现开首语这样写道：*Holy Trinity Episcopal Church* 的地基建在波士顿后湾，由 1074 个桥墩支撑着。接下来的 8 页详细介绍了这座建筑，这座建筑被认为是美国教堂建筑的典范。

在麻省理工念完大一后，我又去了电镀厂。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高端的电镀厂-Keeler Brass 公司。我薪水提高到了 2.5 美元每小时，工作也更稳定了。整个夏天下来，我一点也没有过敏的反应。Keeler Brass 装备了大概 20 条小的生产线以替代大的流水线。每条生产线有 2 个人操作，一个熟练工，一个初级工。我迅速意识到，我的工作搭档是一个和其余的同事相比在道德上可以称之为楷模的人。例如，他从不随大流故意提高机器的出产数据。这个

人大概 25 岁，是大激流域圣经学院（现在的 Cornerstone 大学）的学生，他上晚班，以养活他五位家人。现在你知道我成长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圈，因此我对“浸礼会教友”一词有些贬低。也许你看过罗伯特雷德福的令人称奇的电影-《大河之恋》。两位主角的父亲是一位蒙大拿州波茨曼市的长老会牧师，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位卫理公会教徒姑娘相爱了。当儿子问父亲什么是卫理公会教徒时，父亲说就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就是一个能让人看得懂的浸会教徒。我不得不羞怯地承认那就是 1963 年我对浸礼会教友的印象。但是整个夏天，和我一起工作的这个年轻人深深改变了我对浸礼会教友的固有看法。

在 1963-1964 学年，我全身心投入到有机化学实验室，这是在联邦安全标准实施之前的岁月，因此我们学生可以没日没夜充满热情地在实验室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个天赐良机，我用其他同学两倍的时间来完成分配给我的有机试剂。一天晚上，当其他的同学完成了他们的实验课程，助教 John Sheats（现在莱德大学的化学教授）来看我用了这么长时间在做什么。他是一个出色的助教，极其耐心并且乐于帮助同学。在做了一些实验室课程方面的迫切的建议之后，他告诉我在我这个年纪年轻人应该考虑三件事：职业前景、未来伴侣以及与上帝的关系。在讨论完前面两个话题之后，他继续跟我分享如何变成一个基督徒。在此后的 9 年里，我依然抵触上帝，因此我婉谢了他，但我从没有忘记我们的谈话。顺便提一下，John Sheats 是个叫做校园传道会的一员。我的非教徒同学和我调侃他们是“上帝的使者”，但从那次和我亲爱的助教交流后，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1964 年的夏天，我回到大激流域的卡尔文学院学习第二学年的德语课程（化学系学生的必修课）。卡尔文学院是个基督教学院，因此作为申请就读的部分条件就是我要写一下现在的宗教信仰情况的简介短文。我轻描淡写地说道：虽然曾经一度有人认为圣经具有历史价值，但是像我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懂得更多。显然，他们愿意接纳非基督徒的学生，尤其是在夏季。我在卡尔文学院学习德语时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每节课之前，教授都会祈祷。此举证实了我高中在大激流域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大激流域有大概 3 成人口是宗教狂热者，其中大部分是德裔。不过说实在的，我对德语课前祈祷并无反感。我父母对城里的德裔的宗教观念不存好感，但认为他们是勤劳，诚实的好邻居。

我在城里上高一的时候就为一个叫凯伦拉斯姆森的女生所钟情。我们在一个能容纳 150 人的大厅学习，我坐在她前几排。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当她走到教室前面削铅笔时，我的心会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我永远忘不了那些美好时刻。我喜欢她不无理由，她低我一年级，并且是校花级的美女。高中时我们也有一些约会，不过那时只是礼尚往来的友谊罢了。随着我对她的逐渐了解，我意识到她是一个极其聪明和有道德操守的人。在 1964 年我回大激流域学习德语的那个夏天，一个一生难求的机会自动出现在我面前。凯伦的哥哥埃里克在当地一个初级学院学习微积分课程来达到医学院的要求（他最终成为西雅图附近有名的耳鼻喉科医生）。由于前 4 年没有学习任何数学课程，他的微积分不是学得很好。因此，谁来帮忙？当然是凯伦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有点古怪的朋友我了。显然，如果一辅导完就把导师赶出家门是极其尴尬的，因此我每晚都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和凯伦说话。凯伦也似乎发现我比高中有所进步，因为就在我们彼此返校后不久，她带上了我的 SAE 友爱胸针。顺便提一下，埃里克的微积分考试得到了他所需要的 B。凯伦的父亲，西密歇根最有名的喉部外科医生，给了我 75 美元作为我的辅导酬劳。

凯伦的家庭参加的是大激流域的东公理会教堂。虽然没有我们参加的教堂有名望，但是在无基督教信仰方面是差不多的。因此我们在这个方面能理解彼此。凯伦（主修艺术史）在她们学校-威尔斯学院（由亨利-威尔斯创办）在宗教信仰方面属于少数团体。学院位于上纽约州的美丽的卡尤佳湖畔，距离康奈尔大学 25 英里。她讲了一个有关她新约圣经课程的

利曾伯格教授的故事给我听，对我们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检查凯伦新约圣经的课程时，利曾伯格教授问凯伦及其他同学如何解释耶稣死后六个星期其他六个朋友的大无畏精神。这精神是令人惊奇的，因为耶稣死后这几个人就被驱赶到一个密闭的房间内达 6 天。利曾伯格教授说道：“也许是，仅仅也许是，这些人被某些神奇的事情的彻底改变了，他们用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活着的耶稣。”

每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都要在毕业前完成一篇研究论文。我想成为一名光谱学家，但是我不能鼓足勇气去问 Richard Lord 教授我能否在他的实验室工作。所有化学类毕业生的课程顾问是 Walter Thorson 教授，最终他问我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选择到哪个实验室来完成毕业研究论文。意识到我的为难，Walter Thorson 教授要求我跟着他，说道：“你是化学系最棒的学生，为什么不跟着我做些化学理论研究？”Walter Thorson 教授被同学们选为那年化学系最受欢迎的教授，因此我很高兴为他工作。Thorson 小组包括 4 个博士生和我，因此，我们大家相互之间很了解。Walter Thorson 教授也许看出来我对神学有浓厚的兴趣，有一天他问我：“你想知道我信上帝的最佳理由吗？”作为一名顺从的学生，我以坚定语气回答说：“很想知道。”他的回答是：“因为我每天都和上帝交谈。”教授的反应比较怪异，很有一丝超级可怕的超自然现象的味道，就像当年很流行的电视连续剧《阴阳魔界》一样。事后教授还试图跟我解释祈祷的类型，不过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太深奥了。虽然交流很不容易，但是我依然很尊重 Walter Thorson 教授，并清楚地认为他的基督教信仰是虔诚的。

1966 年 9 月 2 号，我和心中的女神凯伦结婚了。我们驱车 2000 英里从密歇根州到加州来度蜜月，后来在那里，我们都成为了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凯伦要完成她艺术史的学业，我也要开始在化学物理学方面的博士阶段的学习。我们开始参加帕罗奥图市 St. Marks 圣公会教堂的礼拜，尽管我们第一个周末的经历有点令人震惊。由于去得太早，我们被安排去听高级牧师 Leonard P. Wittlinger 的礼拜课程。他花了 45 分钟去描述毛泽东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基督徒之一。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此事不可轻信。毛泽东需要对数百万中国人民的死负责，而耶稣却让人死而复生。在教堂活动结束后，我们遇到了一对很好的夫妇-- Jim and Nan Hobson，他们邀请我们去他们温馨的家共进午餐。吉姆在胡佛学院工作，该学院是斯坦福大学以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命名的一个分支学院。吉姆和兰都来自南方，事实上也是我们最早认识的南方人。我们和吉姆的友谊让我们在 St. Marks 的礼拜持续了有一年多，尽管我们不喜欢牧师的有些政治言论。然而，在一个礼拜天的早上，Reverend Wittlinger 在布道中说一个针对会众的调查表明，一大部分的会众不确定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无需担心，牧师同时也说道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也不能确定对上帝的信仰。我们再也没有去 St. Marks 教堂。Reverend Wittlinger 大概在一年多之后离开了教堂，在帕罗奥图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成了一个有钱人。

我们精神之旅的下一个站点是帕罗奥图市中心的 First United 卫公理会教堂。牧师是一个白发慈祥的老人，他的布教总与越战有关。这不足为奇，读者需要知道这是 1968 年，我们住在旧金山以南 30 英里的地方。毒品、性交和政治游行就像电影阿甘正传中描述的一样。在听完我们对越战想知道的信息之后，我们又辗转了几所教堂，最后我们选择了 St. Bede's 圣公会教堂，仅仅跨过圣希尔街就到了。这座教堂堪称当时加州建筑的瑰宝，几乎全是用天然红木建成的。牧师是英国人- John Burns 神父。Burns 神父聪慧过人，信仰上帝，并认为越战的惨状不是唯一合理的布道内容。斯坦福大学数学系的 Henry Bacon 教授也是到 St. Bede's 做礼拜，他和他夫人以对学生敞开家门而闻名，我们在他好客的家里享受的午餐着实令人难忘。他也信仰上帝。

我一生印象最深刻的教堂活动发生在 1969 年的复活节。Burns 神父在 St. Bede's

Episcopal Church 做布道时的开场白至今萦绕耳畔。“如果耶稣不能起死回生，那么基督教将是一大耻辱。” Burns 神父说道。教堂活动结束后我走到 Burns 神父那里对他说我被他的第一句话震惊了。他问我是否相信基督的复活。我回答我并没有想这个问题尽管凯伦的宗教老师早在 4 年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神父要我从历史事件中考虑基督复活这件事。

这个时机很巧合，因为我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朋友当时都为了一本叫做 *The Passover Plot* 的书所兴奋。这本书读起来像一部快节奏的小说，让人爱不释手。书中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耶稣被鞭打到了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地，一大部分的受害者被杀戮。他越过耶路撒冷城外的山丘直到精疲力竭，他被一个北非的路人所替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面 6 个小时，最终被巨大的标枪刺穿身体，血水直冒。耶稣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埋葬洞穴里。在这个确定的描述之后，作者荒谬地认为洞穴的凉快让耶稣复活，几天之后，他健康地出现在他最亲密的朋友面前。我对这个结论的反应是完全地不相信。从科学上讲，耶稣没有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是不可预估的。事实上，正是 *The Passover Plot* 的不真实性更让我去严肃地调查基督复活的历史证据。

我对基督复活历史证据的调查持续了 3 年。最后，我不仅认为耶稣起死回生，而且这也是对古代历史事件的重要证明。有关这方面最广泛被接受的书是 Frank Morrison 写的 *Who Moved the Stone?* 比较重量级的有利物浦大学 F. F. Bruce's 教授的大作 *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Are They Reliable?* 如果你需要更纯粹的学术著作，我推荐 Wolfhart Pannenberg 1977 年的著作 *Jesus - God and Man*。21 世纪在这个领域最新的著作出现在 2003 年，N. T. Wright 创作了一部名叫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Son of God* 的 817 页的作品。

如果我相信耶稣起死回生一说让我成为一名基督徒，这种理由表面上不错，但事实不是这样。我的其他一些行动也要与大家分享。

1968 年 12 月我得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助理教授职位。对于一个年仅 24 岁，没有做过超过博士研究领域东西的年轻人来说，这太不寻常了。更重要的是，很幸运，因为此后对于年轻学者的工作市场缩小，我很多有才华的同学都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位来开展他们的科学生涯。

我和凯伦从斯坦福向北搬了 40 英里到了一个叫做奥林达的田园小镇，就沿着伯克利的海岸小山丘。凯伦获得了一份在附近的 Moraga 村子叫四年级小孩子书的工作，我每天驱车 8 英里去伯克利。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我们每周 80 小时在工作，其余的时间在陪伴对方。

在奥林达的第一周，我们选择了当地的圣公会教堂 - St. Stephens。直到我们第三周参加礼拜时，一切都很好。那一天，教堂第二次募集资金，这次是为一个叫 Angela Davis 的女人做合法辩护。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学助理教授，最近又知道她是共产党的高级人员，她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解雇了。因此教堂将营救这个共产党员。我有一丝联想到 Leonard Wittlinger 维护毛泽东这样一个谣传的现代基督徒。虽然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对 Angela Davis 的反感却来自另外一些方面。第一，加入加州大学任何一个学院的条件就是签“誓言”，在誓言中个人必须做出不加入任何主张武力对抗美国政府和加州政府组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声明。我对 Angela Davis 的不满是她签署誓言时就故意撒了谎。是共产党是一回事，但说谎在我的资产阶级道德准则中则更加严重。我们没有对 Angela Davis 的救助基金会捐款，并再也沒去 St. Stephens 圣公会教堂。

在这个时候，我和凯伦陆续尝试了圣公会教会、公理教会和卫理公会教派。考虑到我的德裔血统和凯伦的丹麦血统，我们打算尝试新的教会 - 路德教派（补充说明一下：我的德裔血统已不那么明显，我的曾曾祖父 1836 年从德国来到美国）。因此我们向东驱车 5 英里去临近城镇拉法叶特的 Our Savior's Lutheran Church。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堂，人们也非常友

好。他们唱圣歌就好像他们自己就意味着圣歌，而不是想找个机会站起来或者缓解无聊的机会。但是再一次，第三个礼拜天发生了危机。Al Rommereim 牧师做了一次有关地狱和魔鬼的布道。更糟糕的是，他认为地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而魔鬼是真实的人。这太过分了，全然不顾教堂其他人的感受。凯伦和我能容忍魔鬼是邪恶的化身的观点，但是魔鬼是个真实的人的说法绝对是黑暗时代的糟粕。这与我们成长时所教育的一切相违背，因此，我们再也没有去 Our Savior's Lutheran Church。

考虑到我们逐渐缩小的宗教选择，凯伦和我总结到我们的信仰和那些共产主义者的距离要比相信魔鬼的人的远得多，所以我们尝试了另一家路德教会，在离家大概 10 英里的周边城镇沃尔纳特克里克。Trinity Lutheran Church 也是个非常受欢迎的教堂，Paul Meyer 牧师在我们去的前几年没有做有关地狱和魔鬼的布道。在第五个礼拜日，Meyer 牧师问我们是否愿意为教堂的高中学生做些事情。回想起来，这对于教堂来说，不是一个明智的行为。Meyer 牧师并不知道，我和凯伦当时并不能真正懂得基督教信仰的任何一条核心教义。然而，凯伦和我年轻而精力旺盛，我们为教堂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们提供了一辆崭新的雪弗兰车，在安全带法案没有生效前可以装载 20 个青少年。

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送这些孩子去附近的 Mt. Diablo 的山坡上举行个一个烧烤野餐和放风筝的活动。玩了一个下午之后，大概有 20 个人手拉手站成了一圈。这毫无疑问对我来说是个很不舒服的事情，除了牵过凯伦的手，我没有和其他人牵过手。少年们说他们要祈祷，我对祈祷的印象就是打开圣公会教会的 *Book of Common Prayer* 这本书，在合适的地点把书里的内容读出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个高中生打算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来为某人祈祷，并且认为这个人就是上帝。事实上，这些祈祷的孩子都是看上去正常、健康、充满生气的高中生。这是一次令我永远难忘的经历。

教会给我的第二个任务进行得也比较令我吃惊。我们送 20 个少年去奥克兰市民中心去听一个叫做 David Wilkerson 的演讲。我被告知 David Wilkerson 先生写了一本叫做 *The Cross and the Switchblade* 的书，几所高中的学生读了这本书，并觉得很好看。凯伦和我把他们安全送到大教堂，并集中到距离活动区域有点距离的阳台上。Wilkerson 那晚表现得非常严厉，他直率地坚持如果任何人想吹口哨，那么请离开这座建筑。现场变得十分安静。而且，Wilkerson 用的一些词汇对我来说特别陌生。“献身给基督”，“被获救”，“重生”，“接受耶稣”，诸如此类。在演讲进行到三分之二时，他要求所有愿意和上帝做交易的小孩走到前面来。这对我来说没什么，但当学生们在交易进行中走到楼下时我愈发紧张了。我担心的是我不能把所有的孩子自此集中到车里，还有几个孩子可能会在奥克兰市民中心附近被谋杀。大概有 2000 名学生到来市民中心的一楼，David Wilkerson 告诉他们说在与上帝做交易之前，他们必须完成另外一项交易。当 Wilkerson 要求孩子们把毒品和吸毒工具全部上交时，我认为他在开玩笑。孩子们看上去都很清纯。当毒品最终堆到 3 英尺高的时候，我简直惊愕至极。我也不能肯定我们教会高中的孩子是否也上交了毒品。我记不得在收集了毒品之后 Wilkerson 还说了些什么，肯定是与上帝做交易什么之类的吧。凯伦和我从来没碰过毒品，并一致认为毒品是可怕的东西。不管 Wilkerson 的行为能起到多大效果，我们还是钦佩他为减少旧金山地区毒品的泛滥做出的努力。我们重新集合了所有的学生，并把他们安全送到教堂。同样重要的是，上帝正在慢慢消融我们对基督教的抵触。

过了段时间，我们把这些孩子送到了离 Walnut Creek 东北 80 英里的萨克拉门托去听一个叫做 Billy Graham 的人的演讲。Billy Graham 相对于 Wilkerson 让我感觉更舒服一些，但我不得不承认，基本的印象是差不多的。我开始对基督教越来越有好感了（这正是我考证耶稣死而复生的那段时期）。但我依然暗自抵触那种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上帝的言论。我对教会高中的一个很棒的学生印象深刻。他是 Ygnacio Valley 高中橄榄球队的明星。这是一个有

2000 名学生的公立学校。橄榄球队队员都是那种高大壮汉，有趣的是他在球队的第一年最多是个中等选手，他的业余时间在做毒品生意。但当他变成一个基督徒之后，一切都变了，包括他在球场上的表现。当谈到耶稣对他生活的改变时，Craig Mechler 总是非常积极。

与此同时，Paul Meyer 牧师问我能否在周日给这些高中生教书。我想我都能在伯克利学院教大学生，教这些小四岁的孩子应该足以胜任。讲课的内容是《出埃及记》，圣经第二部分的内容，但我的第一课不仅仅是对出埃及记而是对圣经做一次简介。尽管我在这方面知识贫乏并且还没完全笃信，但我还是解释道虽然很多现代人认为圣经充斥着错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能从《出埃及记》之类的书中学到许多现实的道理。著名的有神论者鲁道夫布特曼和保罗蒂里希也没有做得更好。根据我的回忆，那天早晨的学术演讲并没有得到 Craig Mechler 的认同。我想甚至会怀疑我是否相信圣经，并且要求 Paul Meyer 牧师换一个人来讲课。思考了几天之后，我想到了一个对我大有帮助的类比法。在大一新生的化学课上，我们为了减少学生名单疑惑，经常简化一些不确定的物质。因此在礼拜天的课堂上，我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我教出埃及记就好像它本来就是真实的。

在教学过程中，我意识到有几个学生对于圣经的了解比我更多。为避免尴尬，我采用了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一个学生读几句圣经的句子，然后我问同学们其中的含义。这样使我的异端的思想留在我自己这里，直到同学们最终得到正确的解释。这个周末课程持续了好几年，涉及到了圣经中的几部典籍。在那里教书的最后一天是 1973 年的一天（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那天教的是使徒约翰的《约翰一书》，他是耶稣最亲密的朋友。在第五章的第十九句，约翰写道：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的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真的被这句话所困惑住了，所以就问学生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个最聪明的学生立即说道：“太简单了！就是如果你确信你信耶稣，那么你将升入天堂。”我并不认为她的结论这么简单，我生命的前 28 年都没有信上帝，也没有对永生有概念。事实上，如果是三年之前，谁要是说她将升入天堂，那么我将认为这个人极其狂妄的。我和凯伦白天也讨论了这个话题，晚上我们回去查阅圣经确实查到了这句话，第二天早上也同样如此。

“知道你会升天堂吗？”这是教堂高中的年轻女生所笃信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与我从小学的东西相悖。这样的观点在我两年后与父亲的交流中得到了清晰地认证。我问父亲他是否确信自己升入天堂，父亲说当然不能，没有人能确信这种事。父亲继续揭示了上帝会以哪种方式决定一个人是否升天堂。他说：“儿子，你应该懂得这些。就像我在密歇根大学用的分析天平一样，上帝把你医生做的好事放在一边，把你一生做的坏事放在一边。如果好事多一点，那么你将升天堂，如果坏事多一点，那么将入地狱。”我认为父亲形象表达了 25 年来我所持有的观点。

但是我常常好奇上帝用什么工具来称好事与坏事。“为什么问我有时做的好事却与坏事相关联？我在伯克利学院做教授的前 4 年，我了解了有关上帝的其他一些故事。其中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很多人信教的不信教的都对耶稣的登山宝训很熟悉。最终耶稣建立一个我所见到的人都无法达到的道德准则：爱你的敌人，为诅咒你的人祈求保佑，对伤害你的人行善，为迫害你的人祈祷”因此上帝给了我们进入天堂的标准：你必须很完美，因为上帝也很完美。

随后的几天里，困惑接踵而来。我意识到，我能去天堂，但不是因为我做的足够好。对于那些想通过自己的德行进入天堂的人，这个标准很完美。我知道我的生命并不适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的，更不要说是万能的上帝的标准了。但耶稣确实是过的那样完美的生活。耶稣

为信任他的人亲自十字架上，耶稣因为我们的罪过而被惩罚。笃信基督，我就能站立于上帝的宇宙之间。

没有人引导我成为一个忠诚于耶稣的祷告者，不过在 28 岁那年深思的几天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已经变成一个基督徒了。我知道我的人生从此和以前不同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才成为基督徒的。许多思想上的障碍都从我大脑中移除了，就像把蜘蛛网从阁楼里去除一样。也许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

尽管还有好多的话要说，但有一件事是有必要的。你将明确地被提醒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时，我对圣经的真实性尚没有信心。从历史证据中我相信耶稣以一种人类前所未有的方式复生了。但我相信圣经的真实性，还需要好多年的时间。认为圣经充斥着错误的这种谬误的想法在我年轻时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很难移除。随着我转变的经历，我更加真诚地学习圣经。我检验每个疑惑的问题，就像科学家对自然界的探索一样。渐渐地我发现所有被称为错误的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事件、圣经的字里行间和正确的源语言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有幸的是，你不需要像我这样刻苦地学习。1982 年大学者 Gleason L. Archer 教授发行了他的著作《圣经难题百科全书》，书中，Archer 教授系统地收集了所谓的一些错误，并逐一为它们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有了 Archer 教授的帮助，你学习圣经的速度将比我快很多。